

# 對臺灣少年犯罪矯治的回顧與展望

趙雍生

## 前言

台灣社會近年來由於經濟突飛猛進，帶動整個社會的繁榮，加上國家解嚴，民主化呼聲益為積極，少年問題之對策也因時局而面臨新的挑戰。此階段的台灣社會面臨一歷史性「轉型期」，傳統與現代衝突增多，根本的價值觀，理想、信念，亦有了重大的轉變。

一向列為社會問題重要問題之一的少年問題，在此變遷迅速的社會中，受到極大的衝擊，以往我國對少年偏差行為或犯罪，無論家庭、學校，或司法體系，多採嚴厲的懲罰，以期能遏阻青少年偏差的產生。此種策略過去實施成效並不顯著，少年犯罪率仍與日俱增，再犯率亦居高不下。隨著民主風潮的興起，少年們也同樣地受到這股風氣的影響。原本具有正面意義的開放，卻令他們感到舉手無措。髮禁解除，舞禁解除，高中生出國留學開放，聯考制度的重新檢討，娛樂業的興盛翻新……等等；傳統與現代新舊價值交替衝

突中，少年們面對的是一個五花八門全新的社會。在無前例可循的狀況下，實際上是自己在摸索，探試，對於這個突如其來從「禁制」到「解放」，對少年來說，可謂是一不小的衝擊。

## 社會變遷與少年犯罪

自從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令後，台灣不但在經濟、社會及政治三方面都面臨著急遽的改變，在這幾年間，暴力犯罪及驚人的犯罪率，使社會秩序及法令瀕臨嚴重的考驗。這是一個混亂的時代，不法事件普及社會各階層，每天各處都發生謀殺、搶劫、綁架及暴力攻擊等案件。據法務部統計，少年犯罪人數由一九八二年之一三、九六五人增加至一九九二年之三〇、二三人，少年犯罪人口率由一九八二年每萬人四二·七七人犯罪至一九九二年每萬人有一二二·六個人犯罪。至於未滿十二歲之兒童亦由一九八二年之每萬名

○·九七人犯罪增加到一九九二年每萬名二·九〇未滿十二歲兒童犯罪。現代人在恐慌的大環境下生活要比過去三十年都要嚴重，處於種種的暴力罪行的威脅下，擔憂自己成為犯罪的受害者，為每個人心理的真實寫照。

爲了解決在過渡時期中社會治安的問題，政府執法機關採用「嚴刑重罰」。據估計，單在一九八九年死刑的使用率是等於過去十年來的總和。這是一種令人擔憂的現象。

同時，下獄的比率也快速地增加，少年司法的趨勢在跟隨著大社會的情況而改變，換句話說，這正嚴重地影響著近年來剛開步的少年司法革新運動及以多元化社會為基礎的社區處遇計畫。

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五屆亞太地區少年犯罪防治會議上，筆者曾對當時台灣的少年司法體系抱著批判態度，時至今日，情況並未太大的改變。我們仍然需要為少年法庭的施政改革及其法官角色定義；對觀護制度的爭議；如專業人員的短缺，個案數量太多，欠缺在職人員訓練制度等，以至給予從事感化矯治工作人員極少的職業升遷機會是國內目前司法體系中的一大缺失(一)。在以社區為基本方向的矯治體系，如果我們希望能作出重大改革，那麼，健全的觀護制度便成為聯繫及擴張社區矯治工作中的一個最大的期望了，我們希望政府能大幅增加資源來建立這個司法體系中的主要橋樑。

台灣的少年司法仍然是以機構化系統之輔育院，觀護所及少年監獄三種方式控制著。在第五屆亞太青少年犯罪防治會議中，當我們聽到有為數不少的十二歲或以下的小孩子被關進機構系統裡（輔

育院），感到非常震驚；同時，輔育院中的人口介於十二至十四歲的有急速增加的趨勢。但全台灣一共只有三個由法務部贊助，更生保護會主辦，以社區為基礎的少年之家，每家只能收容八位由八至十二歲少年，因此，最多只有二十四個八歲至十二歲的少年能在政府資助下的方案中受惠(二)。這是一個非常諷刺的現象。在以「經濟奇蹟」自傲的富裕的台灣社會，竟不能對眾多的「問題兒童」伸出援助之手，以豐碩的社會資源運用在這極有意義的社區處遇方案上？台灣在針對問題少年轉向之重要領域上，至今仍未發展出一個綜合性的規劃。因為社會福利機構與司法機構之間缺乏適當的溝通及連繫管道，以致雙方未能為一些非犯罪性的問題或不幸少年如被虐待及被遺棄少年作一合適的安置及處遇，也不能為離家出走少年及受法院監護之少年提供一個社區化的庇護安置處所，進而無法幫助他們脫離少年司法體系的控制(三)。筆者認為如將私有式非營利機構也包括進來，共同戮力提供少年社區式的處遇方案，應該是政府在改善兒童福利及少年司法體系的首要之急。在國外行之多年以自然社區環境之寄養家庭與少年中途之家的轉向方案似為政府可認真考慮介乎司法與福利之間可行的社區方案。社會學者認為：「轉向的結果，避免了傳統嚴厲的司法處遇過程，而減少了少年被烙印的機會及因標籤而招致的不良後果。」(四)

## 兩種以社區為本的方案

寄養家庭與少年中途之家，在美國是兩種在少年福利司法體系社區處遇下最普遍的選擇，並被廣泛使用。(5)筆者覺得它們能提供給台灣少年司法矯治工作者一些有價值的考慮要點。它們是很好的例子來證明如何能挽救問題少年不陷入司法系統裏可行的社區處遇方式。

寄養家庭及少年中途之家不但具有活力、人性，它們是以社區為基本的方案，並且可由政府或以私人方式設立，所以，它們被認為是私人與政府合作的社區方案所能提供的最好服務。

寄養家庭提供問題少年一個自然的家庭環境，這樣，少年的適應問題可以局部地被照顧到，而不必把問題暴露於複雜的司法組織或不人道的監禁式處遇系統裏。這是一個提供服務給離家出走或被虐待的少年們最合適的地方，因他們能再從自然家庭環境中獲益。寄養家庭順理成章成為機構式處遇方法最好的替代品。

另外一個普遍及有效的選擇是少年中途之家的使用。少年中途之家是一個更有組織的環境，它的設計是幫助有偏差問題，家庭問題，情緒問題以及缺乏團體能力的少年有一個暫時而安全的居住環境。一個少年中途之家的設置，往往是一個大家庭環境，容納相當多的少年（六至十二個之間），行為矯治法常常被用來調整寄住少年的行為，輔導員在訓練有素的社會工作者及其他專業人士的幫助下扶助少年建立一個有組織的生活方式。小組或個別輔導也是此種社區矯治計畫中的重點來幫助寄居少年。這是轉向處遇式大量被利用，以社區為基本計畫的方案。少年之家已被證實為一個有效的社

區方法來替代機構式司法處遇系統。

這兩個例證正好給我們一些端倪為被監禁少年尋找以社區為基本的方案，從而證明在我們放棄機構式系統替少年提供服務時，這些選擇是切實可行的。

但令我們擔憂的現況是：在近年，由於少年暴力的增多及台灣法治的普遍惡化，於是在管理少年罪犯時就偏向嚴刑重罰；以社區為基本的問題少年矯治方法及計畫會被擱置一旁。實際上，我們憂慮它們會由於社會現況而遭受當權機關所摒棄，或者嚴重地限制這種有潛力的方案的發展。

## 懲罰與復健觀點的更迭與爭議

懲罰與復健是司法矯治哲學裡的兩個主要觀點。所謂「懲罰」乃是指將犯罪行為視為一種違反社會規範的行為，因其行為危害社會，故行為者應負其行為之責。懲罰具有嚇阻 (deterrence) 作用，主要目的在嚇阻犯罪者，因受重罰後心生畏懼而不敢再犯；其次則在嚇阻社會大眾及有犯罪傾向者，以前車為鑑，不致重蹈覆轍而身陷囹圄。同時，懲罰有其明確性，迅速性，嚴厲性及因果關係，對於違法行為採取「罪刑法定」。

「復健」乃是將犯罪行為視為一種病態，這種病態可能是個人或社會的因素所造成的。針對此種病態，而對個人施以個別化，團體化多元性的處遇，或針對社會制度予以改進，以祛除環境中的不

良因素。復健措施具有治療效果，目的是使犯人能恢復正常，重新適應社會生活。其形式有個案諮商、家庭治療、社區組織，社區更新、不定其刑、保護管束、假釋等等。以教化來改造個人，著重少年的成長及發展。」<sup>(六)</sup>

西方復健哲學觀源於廿世紀美國，大盛於七〇年代中期，卻在七〇年代末期八〇年代初期式微。由懲罰—復健—懲罰，好像像走了一個循環，現在又回歸到懲罰；從歷史發展觀之，社會的變化，像一面鏡子，可讓我們鑑往知來，不會去犯同樣的錯誤。<sup>(七)</sup>

在過去幾年中，台灣少年司法體系的改變，正好與世界性少年司法體系的發展相符合，在暴力猖獗的時候，台灣大眾對少年犯罪的觀點比較接受懲罰及機構式處遇，而不接受轉向 (diversion) 方案。在減少犯罪率的前提下，台灣為了要保障社會安全，所以主張對少年罪犯採用嚴刑重罰。反觀西方社會，尤其是美國，在最近幾年內，我們發現美國少年司法系統已經從七十年代積極全面推行 diversion 和 deinstitutionalization 改變成以嚴刑重罰來對待犯罪少年。這是對早期社區處遇及轉向計畫不良表現的自然反應，導致他們把轉向計畫的信念放棄；再加上經濟衰退及轉趨保守的社會觀念<sup>(八)</sup>，於是形成美國對社會改革計畫大量削減經費，整體社會福利方案的預算也嚴重地受到打擊。所以，財政資源的委縮導致美國很多新的針對問題少年的社區計畫遭擱置。美國犯罪學家 Krisberg 對八〇年代的少年司法體系極為失望，他說：

「我們現正面臨少年司法改革的分水嶺時期，前一時期所提倡

的反機構化制度，轉向計畫及少年司法改革都受到公開的批評及質疑。處於這個理論爭端時期，國家的少年司法系統變得更形式化，更受牽制，且更偏向於對少年犯嚴重的處罰……在此分水嶺時期，我們面臨更多的挑戰，但此時也是我們重新思考及定位少年司法的契機……」<sup>(九)</sup>

不過，台灣的情況與美國不同，台灣從未曾有機會去嘗試少年司法的轉向制度，目前處罰之所以被看重主要是社會過渡時期中特別的政治及社會所致的，這是司法機關對一個混亂社會的一種反應，但在實際上台灣與美國的經驗不同：美國強調處罰是由於已試驗轉向方案失敗，加上嚴重犯罪的年齡每況愈下，以及民風轉趨保守時期社會對法治的需求。所以，表面上，台灣及美國兩者在少年司法系統上都回歸到以處罰為主的方向去，但是，基本上就遠因，背景及經濟上，他們的發展都各有迥異的。

台灣司法對少年犯罪的處遇是以民國六十五年所頒布的「少年事件處理法」為其實施基礎。整體而言，其立法精神及處理模式傾向懲罰。少年輔育院乃至少年監獄到目前仍是訓誡教誨及軍事式管理為主，對輔導及復健觀念的引用比較不受到重視。由此可見懲罰與復健哲學觀的更迭，與一個國家的傳統與文化及社會價值的趨向，是息息相關互動的。

台灣的少年司法分為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對犯罪少年採取重罰；另一個極端是對沒有問題的少年不予理會。而對問題少年尚未達司法干預標準者，則亦無所謂，不予處遇也不提供任何服務。其

實這些問題少年為數極多，我們把機構式處遇當作對待少年罪犯的萬靈丹。雖然機構式處遇能在特別情況或時期中發揮作用，但是為著我們下一代少年著想，我們還是應該朝發展社區矯治及預防政策的方向走。

傳統上，懲罰是中國改過遷善哲學中的要點。台灣的少年司法對罪犯主要是懲罰。輔育院及少年監獄的少年犯，受軍事化的管理，即使有矯治的觀念也是在監禁機構內接受一些教育性、品質性的課程，而從未想過要在監禁機構外的社區來從事矯治復健。

一九八八年法務部提出的少年之家的方案，為少年司法的一大改革。可惜的是這個改革在肇始之初，就被當時社會的少年高犯罪率及社會經濟緊縮的不利條件下所阻撓，而遭到不能繼續拓展的命運，只能維持目前的規模。所以我們說台灣的少年司法並沒有機會真正完全發展轉向復健方案是正確的。台灣的少年司法體系似乎又退回到以往以處罰為主的方向去。

在過去，政府在問題少年監禁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把青少年放進機構不應是唯一的方法，因為監禁並不能解決問題，它只能把問題鎖起來，與社會隔離一段時間而已。我們如果鼓勵更多的私人團體參與發展以社區為基礎的社會康復計畫，以政府資助的方式，提供非營利私人機構更多的機會來幫助離家出走的少年回歸正途。這種政策是正面的。

私人資源可幫助政府提供問題少年多種的個別選擇與服務機會，政府亦能藉著廣大的私人資源，負起更有效的監督責任，並執

行定時評估及建立確保服務品質的最低標準。但政府在對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機構的參與上，則應嚴加規範。

長遠來說，就經濟事實及成本效益上來看，台灣需多加注意機構制度以外的其他方案，因機構制度的成本非常高且急劇地在惡化。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其他方案就更形重要了。且機構性的監禁制度對一些少年虞犯包括逃學、固執任性、及離家出走少年等來說，應該是最後的選擇。我們要提供反機構式的社區福利方案將這些特別犯規者從少年司法網裡放出來。

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國外對懲罰與復健的爭議仍持續不已，然有一方面與我國很不相同的是：國外（尤其美國）對少年，兒童福利的措施有特別的照顧與保護，儘量保留他們住在自己的生身父母旁。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遷移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庭；且美國少年工作者會基於保護少年的緣故，儘量將少年安置在類似自然家庭環境的社區處遇方案內，使少年能儘可能在好的環境下成長。先由社會福利機構提供服務，在不得已的最後一站（last resort）才會把少年送進司法矯治體系。因此他們對少年主要仍抱持著復健思想。這與我國以懲罰為少年司法體系及少年服務的主體，旨趣大異。這種現象反映出兩個社會基本上對少年處遇觀點上的分野。

今後我國少年犯罪矯治思想如能與少年福利思想結合，多以社區處遇方式出現及各種取代方式替代監禁刑；少年司法體系之少年法庭法官如具有將少年判決交付福利機構處遇的裁量權，則此二個



體系才可相互交流；對少年司法革新及少年福利來說，這都會是一個值得鼓勵的新方向。

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少年犯罪矯治工作正處在一矛盾的困境，究竟應取向懲罰抑取向復健？尚無定論，因一方面現代社會無論在政治或經濟上的考量，都以懲罰為重。又因復健成效不彰，在社會要求確保社會安全呼聲日高的情況下，只有走向懲罰之途，然另一方面，人類文明的發展卻又要求社會應尊重青少年的成長 (Youth development)，少年權利的維護。在九〇年代民主化運動浪潮下，我們仍以保護少年為國家的終極目標。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代的少年犯罪防治方向，正是這二種思潮錯綜複雜，矛盾不得解脫的混合體，時而重視復健，時而重視懲罰。

我們若重視公衆福祉 (Public interest) 則會請求社會控制，以懲罰為主；若要重視個人福利 (Individual Welfare) 則會注重個人的成長，採用社會工作取向之復健觀念<sup>(a)</sup>。如少年犯罪矯治工作偏向處罰，即顯示社會重視公衆福祉。社會大眾對於少年犯罪率直線上升，居高不下感到焦慮而反應到政治訴求上，政治領袖只得在政策上作變更，恢復嚴苛方式。而當社會民主風氣昌盛時，少年犯罪矯治工作會重視輔導，講求個別差異及個別處，對少年加以保護。一般說來，祥和社會偏好復健觀念，反之動盪不安的社會則偏向懲罰。但事實上若將不具危險性的大多數偏差少年監禁起來與謀求公衆福祉之思想亦有衝突；如何能將輕罪少年由高度戒護機構轉移到社區機構，才是真正謀求公衆福祉之道。

此外，對於九〇年代少年矯治工作私有化之發展，筆者認為，此種觀念雖為現代矯治工作趨勢之一，但我們不能不小心過度發展私有化的陷阱，因私人機構從事矯治工作的主要動機為謀求利潤，與公立或私人非營利機構從事矯治工作的動機以保護社會安全，維護公衆利益截然不同。因此我們若輕易將青少年問題的處理交在唯利是圖的私人機構手中，他們只計較投資是否會回收，而不以少年福祉為重，其效果如何可想而知。會不會比現在公立機構至少還作到維護公衆利益的程度還要差？為此我們不可以不慎重考慮。

西方社會雖然對復健成效感到失望，而轉向懲罰，但事實上，他們並未完全放棄社區處遇方案，現在仍有許多社區處遇方案存在。在美國的麻塞諸塞州，猶他州，紐約州的社區處遇方案現仍相當成功。少年犯罪防治工作者都一致戮力於維護復健觀念，到處奔走遊說政治領袖，期能達到既保護社會安全，又能減少矯治工作不必要的浪費及提高對少年犯服務的雙重目標。<sup>(b)</sup>西方國家在政治環境不利於復健觀念下，仍然力圖奮鬥堅持復健觀念，其動力即基於人本主義對人之信念及對人類文明成果之保護所致。

社區處遇方案，仍然是西方少年犯罪矯治工作之重要一環，表示現代的社會仍然肯定社區處遇方案的價值及存在的必要。美國全國犯罪防治委員會曾指出：「除非所有取代監禁的方案都證明失敗，我們不應興建新的監獄」<sup>(c)</sup>。這是人類文明的表現，亦是人道精神之所在。根據美國全國州立立法會議指出：「社區處遇、取代性的復健方案，與擁擠而具高度安全的監禁機構之同時並存，是現

代司法體系之主要趨勢，也會是九〇年代之主要趨勢。(四)「這段話表示，未來少年犯罪矯治之發展方向，社區處遇方案仍將與其他方案平衡發展，並且相互合作。」

## 對少年司法體系的展望

台灣少年司法體系應朝何方向發展？筆者認為台灣應多發展以社區為主體的少年問題處理對策，把現有不平衡的機構式司法體系作適度的調整(五)。

雖然政府於一九八九年頒布了「少年福利法」，但令我們失望的是，此法仍較偏向於司法取向，不注重社會福利服務。它的目的主要是限制青少年的偏差行為，而不是對他們提供福利與矯治服務。換言之，「少年福利法」仍是傾向「社會控制」，與社會福利的觀點仍相去頗遠。

李總統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五屆亞太青少年犯罪國際會議的開幕致詞中把少年司法制度的困境作出一個結論。他說：「青少年是處在十字路口」，他繼續指出：「但我們的犯罪司法體系和矯治工作，不是也正處在同樣的十字路口上嗎？如何打破過去傳統觀念，採取破釜沈舟的斷然措施，將是未來數年中對我們的一個轉捩性的考驗(六)。」李總統的這番話恰能針對時弊。

李總統對少年司法改革作的重要申述，尚包括以下這番話，他說：「青少年時期，是由青春期到成人的一個轉變期，這個過程，

通常是充滿渴望，不穩定，迷惘和對權威的反抗，這是人類生命週期中的一個重要成長階段。」他接著又說：「我想我們若要幫助青少年安然度過這個轉變期，最好的方法是去了解這個成長過程，將青少年期的各種現象視為正常，不要對青少年的行為過度反應。(六)」

對少年司法體系的改革，他說：「雖然懲罰一直是中國傳統矯治哲學中的要點，而且機構式處罰仍然是司法系統中顯著的特色，但這並不代表我們的司法系統對改革及時代改變是麻木的，很多勤奮的矯治官員及實務者已經努力把重要改變帶入系統中……，隨著我們對以社區為基本的矯治計畫及青少年發展的強調，我們正對以往告別及向一個新的時代邁進(七)」。

我們應把機構式監禁處遇到為司法系統中最後的選擇。對頑強的青少年罪犯來說，若對本身及社會都有重大危險性的話就應被關入獄中；但是對問題少年，若任意的使用機構式處遇，是頗值得我們再三考量的。我們知道標籤過程會影響到少年的一生，從少年期到成年期，這不良的烙印都會跟隨著他。在此成長過程中，少年時期所犯的錯誤，將會影響到他成年後的幸福！

我們一致認為機構式處遇所帶來的壞處比益處多，社區處遇，無論目前如何批評或忽視，但最後仍然會以樂觀及人道的精神去發展。以台灣來說，我們不應走回倒退的階段，因為我們已經走過一段長路才進入現在的發展時期，若走回頭路實屬不智。雖然台灣社會正面臨重大改變，但是少年司法體系的基本改革基礎是不應被

摧殘及放棄的。我們應高舉對少年發展信念的崇高理想，繼續朝發展社區方案的道路邁進！

## 結語

由司法矯治工作的變遷，我們看到一個問題是否會被界定為社會問題在各個時代均不同；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風氣之所向有關(甲)。如在以前歐美有「拯救兒童」的運動，乃是因為當時社會感受到司法制度的不健全，對少年並未給予特別的考量。當時的改革者認為少年是很軟弱，無助的；因此有「少年法庭」的誕生及種種伸張少年權利的運動出現。這種理想式的，以捍衛少年權益為己任者認為當時的不良制度是首要問題。(乙)

但我們在現在這個時代，社會大眾對少年的看法已與前代不同，現今我們認為少年愈來愈趨向暴力，而犯罪年齡越來越低，因此社會對少年不再像以往寄予同情，而認為法律是以保護社會為主要目標，少年犯罪亦成為社會的首要問題，我們主張重罰，認為如再以寬容放任方式，復健方向來對待兇狠的少年犯，不但不能提供矯治，反會平白浪費資源，做成社會更大的混亂不安。

社會問題的界定與社會菁英分子的動向密切相關，換言之社會問題的決定就是社會政治動態的結果。

少年問題是否成爲一個社會問題，見人見智，端視乎由誰來界定之。可以不是一個社會的問題，若是社會不受其干擾；也可以是

一個社會問題，若是某些主流，利益團體的利益受到損害。(丙)且由於不同時期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動，而對少年問題之界定及嚴重性，有不同的看法及處理態度。少年司法體系也會因受社會潮流影響而寬嚴不定。

現代矯治工作重視懲罰，乃是因為社會對少年問題有了新的界定。青少年的需要及福祉不再是社會的首要重點，維護社會安全才是。因此現代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定義更著重在青少年本身的責任上。此一時代界定「少年犯罪」與社會問題，與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界定「少年犯罪」為社會問題方向不同。這與由誰來界定社會問題有關；如由少年權利倡議者來界定，一定站在保護少年，支持社區處遇的角度來看，認為少年犯罪的社會問題是由社會其他問題造成，因此會同情少年；若由捍衛社會安全的角度來界定則會怪罪少年，認為少年應承擔其罪行的後果。

整體而言，筆者是支持社區處遇方案之推展，擴大的，但我們也不是罔顧現實忽視現代少年犯罪之嚴重程度而盲目支持此種相關理念及方案。正如近代有學者試驗提供重犯少年社區矯治，但發現事倍功半，最終的結論還是認為應多花費精力在輕型犯，虞犯身上，成功希望也會較大(丁)。這亦是筆者為甚麼認為應多注重預防工作，而不是等問題已發生，已惡化後才作反應！

近年來台灣社會脫序，不守法及嚴重罪行現象在在都影響著過渡時期中的社會治安，嚴刑重罰似乎是應付少年暴力立竿見影的好辦法。阻遏作用成爲社會的必需品，懲罰犯罪就代表公義。雖然如



此，從一個擁有全民長期福祉的民主社會來看，我們是不應放棄發展給問題少年更有意義及可行的社區矯治處遇計畫的。

台灣現正面臨著社會，政治及經濟各方面的巨大改變，社會變遷不可避免的會帶來社會價值觀的轉變。有時候，此過程並不一定順暢，但是一個國家應該要有勇氣及洞察力去面對現實並接受這個大時代的挑戰。

這確實是台灣在九〇年代少年司法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本文改寫自作者發表於一九九〇年第三屆中美犯罪研討會之英文論文：Further Reflections on Juvenile Justice in Taiwan，作者現任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 註釋：

- (一) 張甘妹 我國觀護制度的諸問題 第一屆中美犯罪防治研究會論文集 一九八八 一八六—一八七頁
- (二) 郭利雄 中途之家與犯罪防治——論述我國少年之家 第一屆中美犯罪防治研究會論文集 二五二—二六三頁 一九八八 另參考趙雍生 少年之家設置之前鑑與前瞻 警政學報第十一期 一九八七 頁二七五—二九〇
- (三) Chao, Winston, "Juvenile Justice in Taiwan: Further Reflection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Police Studies Vol. 13, No. 4, pp.139-144, Anderson Press, Cincinnati, Dec.1990.
- (四) Robert G. Leger & John R. Stratton, "Diversion from the

Justice System," in: Norman Johnson, Leonard Savitz, Marvin E. Wolfgang (eds.)

(五) Fritz M., Morris, Richman, Leon H. & Bakerzak, Edwin A. Group Care of children: Crossroad and Transitions, Child Welfare, N.Y.: League of America 1977

(六) 趙雍生「懲罰平——復健平——社區處遇方案之可行性」警政學報第十二期 頁三一八 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

(七) 同註六 頁三一九—三二〇

(八) Malcolm W. Klein, "De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Diversion of Juvenile Offenders: A Litany of Impediments" in Rose Gialombardo, Juvenile Delinquency: A Book of Reading, 4th edition, N.Y.: John Wiley & Sons Inc, 1982, 00.564-567.

(九) Krisberg, Barry A., et. al, The Watershed of Juvenile Justice Reform, Univ. of Minnesota: Hubert H. Humphrey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1985, p.38.

(十) Lien-sheng Yang, "The Concept of Pao a Basis for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 Institutions, Chicago: The Chicago Press 1973, p. 291.

(十一) 參見 "Can Prison be Huma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and Reflections", Tony Vinson and Winston Chao, in Proceedings to the 1990 Sino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College Press, Oct. 1990, pp. 379-402.

- (卅) Glaser, Daniel, "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in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riminal Policy 36 (1980) pp55-58.

- (卅一) Lerman, Paul Community Treatment and Social Contro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Juvenile Correctional Policy,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75.

- (卅二) Barry A. Krisberg: California's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in Turmoil: San Francisco: National Council o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987, pp.30-31.

另趙雍生「懲罰乎！復健乎？社區處遇方案之可行性」警政學報 第十二期 頁三三一—一九七七

- (卅三) 看 Vernon Fox,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 N.T. Prentice Hall 1977, p.270

- (卅四) 請參考·· Troy Duster. "Crime, Youth Unemployment and the Black, Underclass", Crime and Delinquency 33 (2) pp.300-316, 1987.

- (卅五) 趙雍生 青少年問題探討——社區處遇理念發展趨勢及其在我國施行之芻議 警政學報 第九期 頁二〇九—二二六 民國七十五年六月

- (卅六) 李總統 開幕詞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第五屆亞太地區犯罪防治國際會議

- (卅七) 李總統 開幕詞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第五屆亞太地區犯罪防治國際會議

- (卅八) 李總統 開幕詞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第五屆亞太地區犯罪防治國際會議

- (卅九) 趙雍生 社會方案能解決社會問題？ 社會建設 第六三號 頁四—一一 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

- (卅十) Platt, Anthony M. the Child Saver: The Invention of Delinquency, seco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 (卅十一) William Ryan. Blaming the Victim, N.Y.: Vintage Books, 1971, pp.1-50.

- (卅十二) 請參考·· Charles Shireman and Frederic Reamer, Rehabilitating Juvenile Justice, N.Y. Columbia Univ. Press 1986, pp. 170-172.